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己丑年

译注 朱正义 林开甲

审阅 宗福邦

礼记选译

Z121.7

16:16

现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礼记选译

责任编辑：袁庭栋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礼 记 选 译

朱正义 林开甲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9.5

字数135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D287/03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礼记》四十九篇，又称《小戴礼记》、《小戴礼》、《小戴记》，西汉戴圣撰集。戴圣，字次君，梁国（今河南睢阳）人，生、卒年已不可考，据《汉书·儒林传》所载，他与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同时，是著名的经学家。戴圣和他的叔父戴德都是礼学大师后仓的学生，世称为小戴、大戴。戴圣曾以博士的身份参加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由宣帝主持在长安皇宫里的石渠阁举行的五经同异讨论会，并担任会议记录的整理工作。其后，官至九江郡太守。他的著述，留传至今的就是这部《礼记》；此外尚有《石渠礼论》四卷（见《隋书·经籍志》），即石渠会议的纪要。据清代学者考证，认为《石渠礼论》一书也就是《汉书 艺

文志》六艺类礼家《议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石渠）。只是《石渠礼论》久已散佚，清人马国翰就他书所引广为搜辑，共得二十余条，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另外，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郑玄的《驳〈五经异义〉》中也保存着戴圣阐发《仪礼》的一些议论。

西汉人称某些重要的古书为“经”，把解释说明“经”的书叫作“传”、“记”、“说”。因此，“礼记”这一书名的原义是：对《礼经》（即《仪礼》，汉代又称《士礼》或《礼》）的解说。本来，汉儒在传授经学的时候，除了讲解经典本文，还传习一些有关的古书篇章和前人的说解材料，目的在于使学生加深对经义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大学教学，在教材讲义之外，还印发或开列参考资料有相似之处）。这样，附随经典的记、说一类的材料也就得以流传了。即以《礼经》而论，有关的记、说，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

《记》百三十一篇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另外，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西汉刘向《别录》，尚有：

《古文记》二百四篇

以上这几种，应该说多数都是皇家图书馆（即所谓“秘府”、“中秘”）所藏。因为当时礼学盛行，学者手头所有的此类参考资料，数量当更多。可以推测，在二戴之前，关于礼制的传记之属的著作已有不少了。

戴德、戴圣叔侄俩各自对这些原先可能是比较散乱的材料进行了筛选、整理、编撰。戴德所撰八十五篇，世称《大戴礼记》；戴圣所撰四十九篇则称《小戴礼记》。（按：二戴撰书，对传礼资料各有取舍，自定篇目，互不相袭。前人或谓“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或谓“……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并为误说，清人毛奇龄、王聘珍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斥其谬。）《小戴礼记》自东汉末年著名的经籍文献学

家郑玄作注之后盛行不衰，编入“十三经”。而《大戴礼记》的流传则若断若续，到唐代就佚失了四十六篇，仅有三十九篇保存了下来。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礼记》（即《小戴礼记》），按照传统的说法，一般认为它就是西汉后期成于戴圣之手的《礼记》原书。近代以来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就不作讨论了。

《礼记》就其性质来说，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其中各篇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后之别，大体上是杂采孔子七十二弟子及其后学的作品，兼收其他先秦旧籍而成书。据前人研究，《祭法》首、末两段取《国语·鲁语》而变化之；《中庸》、《表記》、《坊书》、《缙衣》各篇取自《子思子》；《乐记》取自《公孙尼子》；《三年问》取自《荀子·礼论》；《月令》取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篇之首章。以时代来说，主要是战国人的著作，最晚的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初年文帝令博士所作的《王制》。

《礼记》全书四十九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因篇幅较长，各分为上、下两篇），共约九万字，内容浩博，门类繁杂。如果按现代科学的分类来讲，《礼记》所涉及的领域也是相当广

阔的，自政治、法律、伦理、哲学、教育、历史、祭祀、音乐、文学、民俗、建筑、衣饰、器物、饮食到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生物等等，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当代学者张舜徽先生在他的《郑学丛著》一书的《郑学叙录》里，将《礼记》的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语极简洁而中肯：

……其中很多发挥丧服的文字，为研究宗法制者所不可忽视。此外如《曲礼》、《内则》、《少仪》，可以考知古代生活习惯；《学记》、《经解》，可以推见教育原理；《礼运》、《礼器》、《乐记》，说明了古代礼乐的效用；《中庸》、《大学》，发挥了政治伦理的思想。至于《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诸篇，更是《仪礼》的说明书。

在今天，我们要研究上古社会和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进行东西方文明对比的考索，《礼记》无疑是一部必须重视的宝贵资料。

在中国文学史上，《礼记》一书也具有相当的价值。《檀弓》的作者，善于通过短小的故事说明

某个道理，往往用几句对话就能使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言简意深，隽永耐读。这和战国诸子中的寓言有类似之处，同是精妙的叙事小品。后世的笔记小说，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受到了启发。至于象“苛政猛于虎”、“战于郎”、“太宰嚭使于师”、“陈子亢止殉葬”等故事所表现的反苛政、反侵略、反殉葬的思想，则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华，在历史上自有其进步意义。

另外，《礼记》还收有大量的格言，精辟而警策。如：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①。（《中庸》）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②。（《中庸》）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③。（《表记》）

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曲礼》）

这些言近而旨远的话，哲理性强，很可以启发人的智慧。

在过去封建时代，《礼记》被认为是“学术、治术，无所不包”^④，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儒士

①尤：怨恨。 ②豫：同“预”。 ③醴（lǐ），一种带甜味的淡酒。 ④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学术，泛指文教，治术，政治。

们的高度重视，流传经久不衰。追溯其源，首先是汉末郑玄给《礼记》作了简明而精当的注释，使之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合称“三礼”；也就是说，由于郑玄的整理工作，才使《礼记》的地位从经典的附庸上升为“正经”。其后，三国的魏、蜀以至晋初，均立三礼于学官，晋元帝更立《礼记》郑氏博士。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唐初，太宗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①，《礼记》便居其一。从北宋到清末，《礼记》也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至于《礼记》中的一些重要篇目，也从很早以前就有人作专门研究。南宋理学家朱熹作《四书章句》，特将《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二篇收入，而且置于《论语》、《孟子》之前。此后八百年间，《四书》内容一直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题目，成为天下士子们的必读书。

在历史上，《礼记》这部书对中国（乃至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庸》所表述的政治伦理哲学，经过孟子的发挥，形成了儒家的思孟学派^②，魏晋隋唐

①“五经”：此指《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又，唐代以“九经”取士，所谓九经，即五经之外，加上《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宋以后所称的“十三经”，在九经之外，尚有《孝经》、《论语》、《尔雅》、《孟子》。②思孟：思即子思，孔子的孙子孔伋的字。孟，孟轲。

之际又逐步消化吸收道家思想和外来思想（主要是佛教禅宗）的材料，演化为宋明程朱理学^①。过去两千多年间，这一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在中古的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也在《原道》一文里用《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对抗佛教的宗教唯心主义，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常。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都曾以《礼运》里提出的“大同”世界，作为建立理想社会的依据。至于历史上那些刚正不阿、为民请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从某一方面讲，可以说是受到了《儒行》精神的激励。总之，《礼记》在过去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品格、心态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以科学的评价，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历代注释《礼记》的书很多。郑玄之后，唐初孔颖达依据郑注，参酌南朝梁皇侃、北魏熊安生之说，作《礼记正义》七十卷，最为详审，被誉为“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②。北宋卫湜有

^①程朱：程即程颐、程颢兄弟，北宋理学家。朱，朱熹。^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以材料详赡著称。清人的著述中，王夫之《礼记章句》，王引之《礼记述闻》（在《经义述闻》中），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对前人的误说多所纠补，时有可取之处。现代学者中，台湾王梦鸥《礼记校证》、《礼记今注今译》，日本明治书院所刊“新释汉文大系”内收竹内照夫对《礼记》的译注，均可参看。对《礼记》一书内单篇的研究，自东汉以来，多不胜数。今人傅任敢《学记译述》（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顾树森《学记今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张守基《学记注译评》（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吉联抗《乐记译注》（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观点较新，且各有独到之处。

本书是从《礼记》中选取一些通论性质的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传诵较广的名篇名句）予以译注。选出的原文字数不到二万，仅及全书的五分之一。注释大多依从郑注孔疏，也尽量吸收了后人的研究成果。在个别地方，我们觉得过去的说法不够妥当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译文一般采取直译，力图表现出原作的风格、特色。

书中《礼记》原文所依据的版本是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影

印世界书局本），也参用了阮氏的《校勘记》。

在注译过程中，董治安教授多所指导，并审阅了书稿。裘锡圭教授在初稿审订中提出了很好的批评和修改意见。对两位先生的关怀和帮助，我们非常感激，谨志谢忱。

由于笔者学力有限，翻检不周，疏漏错讹在所不免，敬祈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朱正义 林开甲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